

# 建设兵团积跬步 跋涉文学至千里

早年的工厂经历让郑建华的文学梦萌发新芽 直至成“心头之好” 多部小说、剧本受好评

## 人物简介

### 郑建华

历任《青岛文学》小说编辑,青岛市文联文学创作研究室专业作家、主任,青岛市作协主席。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文学创作一级,著有长篇小说《无色花季》《欲望别墅》《家园》《手镯》《情人的森林》《新潮女性系列》等10部,中短篇小说集《滴水樱桃》《阅读初恋》,电视连续剧剧本《金色海湾》《欲望别墅》,另有不少随笔散文。曾三次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。

以下是郑建华接受青岛早报记者采访时的自述:

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抉择,发生在16岁那年。1970年11月下旬,北风已经开始裹挟着胶东半岛的寒意,而我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,面前摆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:一条是服从学校的分配,进入市果品公司,成为一名捧上“铁饭碗”的职工;另一条,则是前往山东建设兵团第五团报到。

那时,我们70届毕业生大规模就业的浪潮已渐近尾声。一个个同学的名字被宣读,一张张兴奋的面孔离开教室,他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,完成了从学生到“工人阶级”的身份蜕变。他们穿着崭新的、泛着靛蓝色光泽的工装,在照相馆拍下那神圣的竖版两寸照片时,脸上那种混合着羞涩与自豪的神情。那不仅仅是一张照片,更是一张通往安稳人生的通行证。

而我,成了一个被遗忘在角落的旁观者。教室里的桌椅一排排空了出来,朗朗书声被交接工作的窃窃私语取代,最后,只剩下我们几个“成分不好”的学生,像秋后残留在枝头的几片孤叶,无人问津。我知道那原因,沉甸甸地压在我的档案袋里,也压在我的心头上——父亲那本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复杂历史问题,以及母亲那顶“现行反革命走资派”的帽子。这两座无形的大山,足以遮蔽一个16岁少女头顶所有的阳光。我决定听从父亲的话去建设兵团。

命运的戏剧性,总在人们猝不及防时上演。几乎是在同一天,我收到了两份命运的通知书。上午,团参谋长和后勤处长,开着一辆绿色的吉普车来到我家。他们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利落地将我那份单薄的行李搬上车。然而,就在吉普车扬起的尘土尚未完全落定之时,下午,学校的蒋老师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,气喘吁吁地在马路旁找到了我。他几乎是喊着对我说:“快!快去学校!你的分配通知下来了,是果品公司!”一瞬间,我愣住了。

家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而紧张,父母争执不下,他们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我——这个刚满16岁的女儿。我去了学校,走进那间熟悉的办公室,对着满屋子用期待目光看着我的老师们,清晰而坚定地说:“老师,谢谢您。但我不就业了,我去兵团。”

话音落下,满室皆静。我看到了



从车间走出来的作家郑建华。 青岛早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宇航 摄

老师们脸上难以置信的惊诧。在那个年代,“老四届”的学长们正背负着行囊,大规模地上山下乡,成为“知青”。而我们70届,能留在城市就业,堪称时代的宠儿。偏偏有个我却拒之门外拂袖而去……

山东建设兵团第五团,坐落在李村。这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地方:它既是建设兵团的一个团部,也是山东省第二监狱,同时还有一个名字——青岛生建机械厂。1970年4月成立的山东生产建设兵团,将许多省属的监狱劳改农场收编改制。我所在的第5团,连级以上的干部全是现役军人,司令部、政治处、后勤处,机构俨然。原地方上的干部,则大多担任副职。我被军务股分配到了团司令部下属的生产股技术组,这让我多少有些意外。

我的文学梦,恰恰是在这片独特而复杂的土壤里,悄然萌发了第一片新芽。这里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,人员构成之复杂,远超我的想象:正在服刑的犯人、刑满后留场就业的人员、看守的武警部队、来自天南海北的复员军人、充满理想主义的兵团战士、严肃的现役军人干部、经验丰富的原监狱管教干部,以及少数像我一样的技术人员……3000多人,3000多种人生,3000多个故事,在这片高墙内外交织、碰撞。

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无色花季》,以及后来的短篇《红色童话》《滴水樱桃》,其灵魂都根植于这片土壤。我们这些兵团战士,年龄最小的“小丁”只有13岁,大多数是15—23岁的年轻人,精力旺盛,思想单纯。而那些服刑人员,则恭敬地称我们为“主管”或“政府”。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关系:我们既要向他们学习车、钳、铣、刨的生产技术,又要在生产劳动中指挥和管理他们。这里面所蕴含的人性张力、命运纠葛,足以写成一部现代的“一千零一夜”。起初,我在技术组的晒图室工作,那刺鼻的氯水气味浓烈得能把人熏得眼泪直流,头晕目眩。

后来来了新战友,我被替换出来,开始学习描图,后来又担任了文书,进入了团理论组、宣传队。我编写各类会演的节目,写朗诵词,写小话剧,写快板书。在“写来写去,演来演去,跳来跳去”的喧闹中,我感受着文字创造世界的魔力。也正是在这时,一个偶然的机会,悄然降临。

1974年11月,山东建设兵团完成其历史使命,被撤销建制。青岛生建机械厂的牌子被重新挂起,归口青岛市重工业局管理。一大批战友被分流到重工局下属的各个工厂,而我,因为此前的文字和宣传经验,得以继续留在厂宣传科,写简报,写总结,编写文艺节目。那本影响我一生的《红楼梦》,便是在集体宿舍的上铺,蒙着厚厚的被子,借着一支手电筒的微光,一字一句读完的。

哦,对了,那个等待已久的“偶然的机会”,1976年,一位姓郭的战友,创作了一篇题为《怒火》的小说。他的故事充满了激情,但字迹实在不敢恭维。他找到我,请我帮忙誊抄。8000多字,我一笔一画,在稿纸的方格里耕耘了一遍。他满怀希望地投给了《青岛文艺》。不久,稿子被退了回来,但附上了详细的修改意见。我至今仍记得,那稿纸上密密麻麻的,是编辑用红色圆珠笔写下的批注,从情节到语句,甚至一个标点,都一丝不苟。我内心深受触动,那时的编辑,是真的在为他人作嫁衣裳,用心血浇灌幼苗。我再次帮战友完整地抄写了一遍。后来,这篇小说果然发表了,而且是头题!

这件事像一束光,照进了我懵懂的文学世界。我心中那个潜藏已久的声音终于响起:“原来,写小说并没那么神秘,我或许也可以试试。”这个念头一经产生,便再也无法遏制。我扭头便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,写了一篇关于工厂技术科的故事。我的战友姚红,家就在信号山路附近的编辑部大院,她热情地领着我,像完成一件神圣的使命般,将稿件送到了《青岛文艺》编辑部。接待我的,是位年轻的编辑,名叫尤凤伟。

一周后的某个上午,科长告诉我:“编辑部来电话了,让你去一趟。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在编辑部,我见

到了吕寰、张健、尤凤伟三位老师(在此,我愿向这三位已故的文坛前辈、老领导、老朋友,表达我最深切的缅怀与敬意)。他们和蔼地与我交谈,肯定了稿子的基础,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。我的处女作——那个以工厂技术科为原型的短篇小说《光明在前》——在1977年的《青岛文艺》上,同样以头题发表了。

1978年5月,我调到了青岛造船厂,在铣床边工作了半年。不久,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恢复活动,而我则在1979年3月12日,正式成为《海鸥》(后更名为《青岛文学》)编辑部小说组的一员。

从此,文学创作成为我“心头之好”。开始尝试散文、随笔,甚至涉足电视剧本创作。我与黄小振、李建国两位志同道合的伙伴,共同创作了31集电视连续剧《金色海湾》。这部剧获得了成功,赢得了一些奖项和奖金。但遗憾的是,才华横溢的黄小振同志,竟在49岁的盛年猝然离世。我将所得的全部奖金,都交给了他的妻儿。

走在文学这条路上,我时常会感到一种渐行渐远的孤独。那些曾经同行、同频、同道的伙伴,愈来愈少了。我深深地怀念他们,怀念那些为了某一篇来稿,我们争得面红耳赤、各不相让,最后不得不以投票表决的执拗夜晚……那些日子,充满了“幼稚的成熟”与“成熟的纯粹”,好怀念啊!

回首望去,16岁开始的兵团以及工厂的生活磨炼是我人生的第一块砖,如果我是跨栏运动员,便是第一道栏,如果我是渔民,便是第一网鱼,人生不就是一块砖一块砖地垒出来的吗?一道栏一道栏跨下来的吗?一网鱼一网鱼捕捞出来的吗?所有的经过都了然于心,古稀之年回首望去,唯有坚韧不拔,做六边形战士,崇尚美好!



扫码观看相关视频  
拍摄/剪辑 记者 刘宇航